

国民经济评论

总第三辑(2018年第1期)

Review of National Economy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趋势:

一个文献综述

林丽萍 丁守海 杨璐嘉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杨志安 高陈慧宁

农地收益权优化配置

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沈秋彤 赵德起

房价与生育率

——基于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赵文哲 张秀臻

非
外
借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辽宁省一流学科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资助

国 民 经 济 评 论

REVIEW OF NATIONAL ECONOMY

总第三辑（2018 年第 1 期）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经济评论. 总第三辑, 2018 年. 第 1 期/刘瑞, 林木西, 赵丽芬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141 - 9719 - 8

I. ①国… II. ①刘…②林…③赵… III. ①中国经济 - 国民经济发展 - 文集 IV. ①F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7048 号

责任编辑: 于海汛 李迎悦

责任校对: 杨 海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李 鹏

国民经济评论

总第三辑 (2018 年第 1 期)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4 印张 270000 字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9719 - 8 定价: 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 举报热线: 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1537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序 言

《国民经济评论》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创办的全国首份国民经济学的专业刊物，该刊同时也被定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的会刊。《国民经济评论》承载着国民经济学家人的梦想，寄托着伟大时代对国民经济学科建设的呼唤！它的诞生，必将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道路上竖起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学科建设需要有学科专属的理论阵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变革和成就已经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理论。以研究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规律为己任的国民经济学人，身临其境，理应积极总结和回应这场伟大经济变革的深刻内涵。事实上，目前全国从事国民经济学教学科研的机构和教师已经成百上千了，专业性论文也层出不穷。可是一直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专业性刊物，国民经济学科论文散布在国内各种其他类型的期刊上。由于学术成果得不到集中展示，专业学术队伍也得不到凝聚。这十分不利于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科共同体。办一本高水平的专业期刊以加速促成国民经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就是我们办刊的目的。

学科理论刊物是专业精神与开放态度的结合。《国民经济评论》立足于采用国民经济学科的立场与观点、原理与方法来研究解决经济问题，这当然意味着它不是其他经济学专业杂志的重复。学科专业杂志是术有专攻、以文会友的平台，因而本刊欢迎全国同行尤其是青年学子在本刊发表国民经济学专业论文，尽力从学科的独有视野分析国民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研究国民经济系统如何管理，并就如何完善国民经济学科体系提出意见。当然，国民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学科大家庭的营养和滋润，何况当代的学科发展存在着融合趋势，因此本刊也欢迎采用其他学科的原理与方法进行分析并发表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看法，鼓励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概念藩篱研究国民经济综合性问题。说到底，研究经济综合性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学的真命题。

学科理论刊物是现实问题的理论抽象高地。理论总是来自实践的，任何理论假设都需要有一个现实中的典型样本或案例做支撑。因此《国民经济评

论》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精神，欢迎实证性的研究论文和严谨的一线调研报告。当代数学工具大量应用在经济分析之中，提升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是数学逻辑必须首先经得起经济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因此本刊倡导思想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论文，力图对当今时代的国内外经济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国民经济评论》的创办宗旨是打造一个具有“国民经济学”自身学科气质的学术阵地，凝聚学术氛围、展示学术成果、推动学科发展及人才队伍建设。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作者的投稿，也希望作者能够在国民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内进行选题，兼顾重大现实问题与长期理论价值。本刊设立了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国民经济基本理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人物专访、会议综述、国民经济热点前沿等专题栏目。

办好一份学术理论刊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当下流行以期刊价值导向而非论文价值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国民经济评论》横空出世，必定要经历一段学术影响寂寞期。但是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坚持办刊初心，出专业学术精品，持之以恒，争取早日将《国民经济评论》办成国内一流专业学术杂志，愿意与每位论文作者一起，实现这个梦想！

目 录

国民经济前沿热点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趋势：一个文献综述

林丽萍 丁守海 杨璐嘉 1

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

R&D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跨国分析

刘 康 15

宏观调控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杨志安 高陈慧宁 30

区域性金融改革成效评价

赵 述 45

国民经济运行

农地收益权优化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沈秋彤 赵德起 63

房价与生育率

——基于 36 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赵文哲 张秀臻 81

中国产业链自给率与增加值分配问题研究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李施其 林 晨 94

经济新常态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减少农村贫困的研究

张 荣 孙亚南 116

“基医主导型”医养结合模式研究

戴 锦 陈亚光 133

雾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于亚申 147

微观运行与规制

内部控制缺陷、产权性质与债务期限结构

段晴晴 164

虫草资源与藏族农牧民家庭生计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来自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的调查数据

王璐瑶 廖桂蓉 179

国内规制经济学二十年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谢 思 王 喆 192

分享经济监管研究

李 佩 丁 洋 204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趋势：一个文献综述

林丽萍 丁守海 杨璐嘉*

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转换也加速推进。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就新形势下经济运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重点突出了供给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等新元素，同时，在宏观政策导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主张。本文试图从经济下滑原因探析、供给侧改革与增长动能转换、基于五大理念的新发展模式、调控政策的基本方向等四个方面对这些最新成果进行梳理，希望能对当下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经济增长 动能转换 供给侧改革 发展理念

一、经济下探趋势的基本原因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尽管 2017 年出现了较强的反弹，但一般认为，未来仍处于下降通道，仍有探底的可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供给面的冲击

诸多研究表明，供给冲击是导致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决定性因素。郑挺国等（2016）基于 DSGE 模型的分析框架，利用反事实方法比较分析了 1992 ~ 2015 年中国 3 次经济下行区间冲击来源的异同。结果显示，前两轮经济下行区间的主要冲击来源为负向偏好冲击，而自 2011 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经济下行区间的主要冲击为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其主要源于

* 林丽萍（1991 ~ ），福建闽侯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管理。丁守海（1972 ~ ），安徽全椒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电子邮箱：dingshouhai@163.com。杨璐嘉（1993 ~ ），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

“人口红利”渐逝、人力资本增速趋缓以及投资结构失衡等因素。类似地,林建浩等(2016)研究发现,新常态下的增速换挡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外部负向需求冲击长期化的叠加。一方面,与制度、技术和结构等因素紧密相关的供给冲击所主导的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下行通道;另一方面,需求冲击主导的经济增长周期持续为负,表明负向需求冲击是新常态下增速换挡的助推因素。总体来说,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供给面因素的影响为主。

(二)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供给角度看,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几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有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在当今中国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老龄化会降低家庭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率,而成年子代向老年父代的代际转移比例越高,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汪伟,2016)。孟令国等(2016)同样认为,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人口数量增长水平有限,很可能难以改变我国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供给下降的问题。进一步地,谭海鸣等(2016)将人口迁移因素纳入分析范畴。他们预测,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在2021~2025年可能会出现台阶式下行,并触发房价下跌和“逆城镇化”现象。

郭凯明等(2016)还从生育率下降改变整体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分析了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以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中国人口转变不利于形成创新和创业的企业家精神,这会扩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而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开始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延迟退休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将会从两个途径影响内生人口出生率。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老年时期收入增加,进而减少年轻时的储蓄,年轻时就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抚育子女,这使得出生率上升;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资本存量减少,为实现年轻时期的消费,个体必须提供更多的劳动,这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严成樑(2016)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而其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增长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人口出生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足以弥补其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增加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能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只能获得短期的增长效应，在长期将出现递减现象；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增长效应呈现单调递增的趋势。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的要素投入（陆旸、蔡昉，2016）。然而，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却不断下滑。有学者测算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技术引进速度和自主创新速度开始在波动中双双下降，且自主创新增长速度不足以填补技术引进速度的降低，进而导致我国技术进步速度放缓，TPF增长率由2007年的11.6735%大幅下降到2009年的6.0614%和2011年的3.8361%（方福前、马学俊，2016）。具体来看，在过去几年间，国企改革、扩大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程度等市场化改革进度过慢，以及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过剩产能不断扩大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加速下滑的重要因素（赖平耀，2016）。另外，徐晔等（2016）还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们以一个改进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了金融资源扭曲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错置通过直接效应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减损0.8021%，并分别通过对人力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产生抑制作用，间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

（四）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饱和

目前，投资依然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最有效手段。2016年，中国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6466亿元，占GDP总量的81.5%^①。不过，民间投资增幅严重下滑问题愈发严重，2016年，中国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65219亿元，增速仅为3.2%。具体来看，首先，盈利预期是影响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在市场上弥漫着悲观的盈利预期时，民营企业既没有意愿去投资，也没有好的项目用来投资，这导致民间投资萎靡不振（张树成，2016）；其次，近些年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这种经济金融化行为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决策，进而导致企业的实体投资率降低（张成思、张步昙，2016）。

在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为了完成保增长的任务，政府投资一直保持在高位。例如，2016年全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18878亿元，增速高达17.4%。但值得注意的是，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债务风险。按照债务率高低，可将经济运行分为债务正常状态和债务非正常状态。在债务正常状态下，经济运行对债务具有反馈作用，即在一定条件下，债务随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下同。

济增长而不断积累,从而会使经济体从债务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当经济进入非正常状态时,高负债开始反过来对经济运行产生负反馈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危机(龚刚、徐文舸、杨光,2016)。因此,我国在通过政府投资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高债务率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2016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这有助于缓解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如果我们探寻日本经济上世纪从高速增长期到中速增长期、再到经济低迷期两次增速换挡过程中的需求动力变化趋势,并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可以预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力量,将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首要贡献因素;投资仍然是中高速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但基础设施业对投资的重要性将下降;而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将有所回调,但仍具有较大成长空间(魏杰、白成太,2016)。

二、通过供给侧改革注入经济增长新动能

改革一直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一般来说,改革通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渠道,通过效率改善、技术提升和要素投入增加等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大于要素增加效应、改革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大于劳动投入的影响等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郭春丽、曾铮、王蕴,2016)。吕朝凤等(2016)从市场潜力的角度分析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他们利用1999~2009年间中国各省份的38个工业行业数据检验发现,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扩大市场潜力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市场潜力越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更明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改革政策带来的红利正在逐步弱化,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我国的下游行业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改革,民营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煤炭等上游行业,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国有企业垄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阻碍了整体的技术进步,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并挤出了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王永进、刘灿雷,2016)。另一方面,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由许多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此时需求管理政策短期内虽然可能会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但仍然无法挽救经济的下行趋势,甚至可能由于刺激政策使结构性问题暂时掩盖,导致未来爆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要求加深供给端的改革力度(刘志国、李丹,201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上,习近平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其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洪银兴(2016)对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要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这既包括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能力,也涵盖了创新驱动、结构调整等方面;其次,要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是结构性短缺,现有供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与此同时,低端和无效产能又占用资源,造成库存和积压,这就要求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最后,要注意充分释放企业活力,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正如前文所述,我国近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逐年下滑,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包括技术进步(技术变化)、技术效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转换。所以,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从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引导产业结构转换三方面着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李平, 2016)。

为此,国家制定“普惠互联网”、“互联网+”等战略。郭家堂等(2016)基于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国的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综合来看,互联网的普及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种有效措施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曹翔等(2016)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四大区域供给侧要素投入的阻尼效应及其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劳均人力资本对中国四大区域供给侧要素投入的“增长红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已经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这说明,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关注劳均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避免出现人力资本投资增速下滑而抑制生产率提升的现象发生。

供给侧改革另一重要方针是减轻企业税负,而增值税改革正是财政减税的重要手段之一。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引入增值税以来,为了实现减税的目的,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在2004年,中国开始从生产型增值税逐步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并于2009年1月1日将改革范围推广至全国;其次,2012年开始,在上海地区针对部分行业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并进一步在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为了研究增值税改革的效果,申广军等(2016)利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全国税收调查”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2009年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

费型增值税这一政策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减免增值税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可以提升短期总需求,还可以在长期内改善供给效率。不过,针对2016年开始的全面推行“营改增”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宏观经济运行,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推进供给侧改革,还要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释放市场活力。一国短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的重新配置,而长期经济增长一大动力来源便是制度质量。在制度质量没有显著提高的经济体中,要素在不同效率部门之间的转移完成的时候就是经济出现新常态的时候。在目前的中国,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地加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韩其恒、李俊青、刘鹏飞,2016)。

最后,从2016年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例如,2016年煤炭价格一路走高,钢铁价格也多次出现剧烈波动,给相关行业去产能造成了负面影响;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为整治“僵尸企业”带来了难度;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6)发现,“去杠杆”各类举措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加速上扬;“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上扬。这些扭曲现象也说明了在2017年继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急迫性。

三、新发展模式是未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指针

在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方向。五大发展理念集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条件、发展维度、发展路径、发展目标为一体,高度概括和综合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多维度加深扩展的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重大指导作用(吴宣恭,2016)。

(一) 通过创新来提质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收窄,导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6)指出,这就要求我国将以技术模仿为动力的赶超型模式转变为促进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

我国目前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仍有待调整,这可以从无形资产投资水平上体现。无形资产是决定创新的关键因素,其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总体来说,我国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30%。从数量来看,2012年中国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已达46600亿元,2001~

2012年年均现价和不变价增长率分别为25.28%和21.81%，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投入强度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从结构上看，我国无形资产投资结构呈现出高计算机化信息资产和创新资产比重、低经济竞争力资产比重的“两高一低”特点，反映出了我国对经济竞争力无形资产的支持政策不足（田侃、倪红福、李罗伟，2016）。

专利保护政策对无形资产投资及创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常情况下，专利资助政策可有效保护产权，起到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但在中国，各省份为激励创新所制定的政府专利资助政策导致了专利授权数量的快速增加。同时，考虑到中国当前制度不完善和监管机制的缺位，专利资助政策激励了大量低质量专利以及缺乏产业运用价值专利的产生，导致了专利“泡沫”现象的发生，使得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质量的促进作用呈现弱化甚至扭曲效应（张杰、高德步、夏胤磊，2016）。

（二）通过协调发展来解决结构性矛盾

首先，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伍山林（2016）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1985~2011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递减趋势，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波动特征，其关键原因是非农劳动部门的制度异质性被固化和农村劳动力教育增速放缓。为了提升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工农业发展关系的协调对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尤为重要。一方面，工业部门不仅对农业增长具有乘数效应，还因为其生产率优势、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资源配置优势，资源配置工业化能够提高全社会边际投入产出；另一方面，农业发展滞后也会限制工业资源配置优势的扩大。因此，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全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徐飞、李强谊，2016）。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服务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其必然取代工业成为未来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一定要注重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推进，工业份额的减少应以工业效率提高为前提，而服务业比重增加同样不能抑制整体经济效率的改进。如果对工业化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做任何调整，而只是一味强调服务业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类似于拉美的长期调整和经济震荡（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2016）。

（三）通过绿色发展提高环境承载力

中国在保持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力度不断加强。黄清煌等（2016）利用2001~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环境规制会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具体来说，环

境规制会抑制各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但其对经济质量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倒逼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西部环境规制却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滑。类似地,陈菁泉等(2016)利用2001~2012年各省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上升,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映要强于中西部地区。

除了宏观的讨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分析某项具体环境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汤维祺等(2016)就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分析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对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不同的排放权分配方式会对不同生产者产生差异化的激励作用。我国目前按照历史排放强度分配排放权,这种机制弱化了减排政策对中西部能源大省经济产出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以拍卖的方式分配排放权由于未偏向于高耗能、低效率的行业和生产者,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环境税的征收是否会增加企业税收负担,进而加大经济的下行压力?范庆泉等(2016)对此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在不征收环境税时,能源过度消耗不能得到有效抑制,环境污染产生了较高的生产效率损失与社会福利损失;而如果征收过于严格的环境税,则有可能导致投资不足,造成产出增长乏力以及社会福利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最后,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税政策通过对能源过度使用的矫正,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降低污染水平,还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四) 开放发展注入新内涵

过去30多年,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较多。不过,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具有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性质,其本质是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且出口导向特征明显。这种分工模式虽然使中国在未掌握核心环节的情况下能够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改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但因为我国以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等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正逐步消失,传统的开放模式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安礼伟,2016)。在经济新常态的新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面临“三期叠加”,即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构建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比较优势的转换期。为此,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出重大调整,要从以往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调整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以加速推进国际竞争力升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为重点,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隆国强,2016)。

（五）通过共享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我国在经历了大规模脱贫和财富总量迅猛增长两个阶段后，现已进入既要提升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又要缩小贫富差距的共享发展阶段。发展中国特色共享经济，关键在于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公平分配的内在逻辑，完善和落实公平分配的体制和机制（庞庆明，2016）。实现共享发展，一定要建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还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通过改变消费需求分布，为工业化中前期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需求支撑（张来明、李建伟，2016）。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来说，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享发展，是未来稳定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四、重构宏观政策体系

过去十年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与应对，既包括2008年“四万亿”计划的强刺激政策，也有近年来推出的注重结构性调整的微刺激政策。但一方面强刺激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政府债务风险的扩张；另一方面近几年微刺激政策效果不断减弱。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多位学者就如何重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进行了探讨。曹远征等（2016）从经济新常态背景入手，认为我国目前对高GDP具有强烈偏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以及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的要求。在重构宏观政策框架时，要将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设定为显性目标，财政政策应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要侧重于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陈彦斌等（2016）则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存在的三点明显缺陷，包括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关系未能厘清，常出现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现象；宏观调控目标过于宽泛，难以使公众形成稳定预期；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等。为此，他们认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大幅简化宏观调控目标，并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

在重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时，要尤其注意政策不一致性导致的经济效应。

张玉鹏等（2016）选取我国1991年1月至2014年7月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基于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实证考察了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此时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对产出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因为消费者信心和银行信贷渠道对政策不确定性的产出增长效应几乎无影响。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政府在

采取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时,需明确考虑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率的负向冲击效应;而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应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无须担心政策调整过程是否会产生很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但需考虑宏观调控工具选择和具体实施过程对政策不确定性性质的影响,尽量使政策调整过程产生“好的”政策不确定性。

田磊、林建浩(2016)进一步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他们利用2001年1月至2013年3月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实际产出只呈现出微弱的负向反应,而价格水平则呈现出强度和持续性均显著的负向脉冲响应。他们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经济运行方式,只有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实物期权效应”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未来随着中国深化改革程度的深入,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会变得日益重要。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我国央行新创设了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彭俞超等(2016)对此研究后发现,再贷款利率、再贷款比例、存款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存款利率四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均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且相对于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非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因此,中国可以在必要时通过使用非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此外,面对急剧上升的经济杠杆率,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放缓货币增长率的政策达到降杠杆的目的。然而,随着货币增长率放缓,中国经济杠杆率却越来越高。对于这一现象,刘晓光等(2016)认为,降低货币供应量会带来投资和消费增长的下滑,进而带来产出更大幅度下降,最后反而会提高经济杠杆率。货币政策“稳增长”和“降杠杆”并非两难选择,而是具有一致性,简单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降杠杆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

随着经济发展,利率管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推进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陈斌开等(2016)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呈现出的多重失衡现象入手,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从金融市场改革开始。只有让利率充分反映市场信息,经济主体才能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做出最优的生产和消费决策,中国多重失衡才能逐步缓解,经济效率才能稳步提高。

中国近年来逐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但同时仍坚持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资本管制一方面可以防范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却可能带来资源错配,进而损害一国长期经济的增长。游宇等(2016)利用78个国家从1995年到2010年的资本管制数据,检验了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债券进行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股票进行资本管制阻碍了经济增长,而对直接投资进行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应该尽量简化或解除对股票和直接投资类资本的过度管制,而坚持对债券